



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意趣”

□姜帅

后藤朝太郎(1881—1945),号石农,日本爱媛县人,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初习语言学、文字学,后多次到访中国,成为“中国通”。生前声名烜赫,身后几乎被人遗忘,但近年来又重新被人审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藤朝太郎出版多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而这本《蟋蟀葫芦和夜明珠:中国人的风雅之心》是一部以中国文化艺术为内容的作品,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文化与民众,并加以善意的解读。作者在其引子中写道:“如果不把中国意趣融入日本青年人能够理解的学习话题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话,那了解中国真相的大门就会永远紧闭。”他的初衷,在于增进当时的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真实面貌的了解,为两国普通民众的交流架设一座桥梁,并对当时日本社会上流行的,对中国污蔑性的曲解加以纠正。可能对于当时的日本人(包括日本青年人)而言,本书只不过是一本谈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普及性读物,但岁月荏苒,如梦似幻,那些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历经人事变迁和社会转折的巨变后,使今天的普通中国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由于有在中国大地上的游历经历,后藤朝太郎对中国艺术的理解,要比一般的日本访游者更为深入与透彻:“中国艺术是在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要想理解中国艺术,首先得去了解中国的自然和社会。如果不了解中国的自然环境,又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更是一无所知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对中国艺术有深入的理解。中国的艺术作品都有其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如果离开了这一背景,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因此,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要想研究透中国艺术,就一定要到中国的土地上



去进行实地调查和实地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艺术。”后藤在书中提到他曾踏足“中国四百州”,即使放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该书图文并茂,有不少后藤朝太郎在中国的摄影作品,今天再看这些老照片仍然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

后藤曾拜访过大同的云冈石窟。在他的笔下,留下了大同古城与云冈石窟在20世纪初的记录。文字记述从大同古城到云冈石窟的路途上的古迹,像观音堂、佛字崖等,今天这些古迹依然存在。后藤提出了个人的见解,甚至是对日本艺术的反思。他以云冈石窟为例,认为“中国的雕刻显得比较粗笨,但其所用的艺术手法却是比较强势的。中国的艺术作品整体给人一种比较稳重大气的感觉,而且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是从不吝啬。中国的大型艺术作品大都采用‘远景本位’的手法,走近了看可能会觉得做得比较粗糙,但是离远了看就会觉得非常美观”。后藤认为日本的艺术家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艺术多少要有些脱离常规的地方……艺术家要从俗事中解脱出来,本着洒脱的心境从更高、更宏大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和宇宙”。

在中国的游历,使后藤也有了对日

本本土艺术教育的反思。他甚至直言不讳其中的弊端:“在明治时代的后半段,日本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将各专业分得特别细,结果导致画家只会画画,书法家只会写书法,诗人只会作诗,学者只会研究学问,能够诗、书、画三者皆备或者诗、书、画和学问四者皆备的人寥若晨星。”后藤朝太郎的解读看似较为浅显,实则一针见血。而历史却又是如此相似,就今日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而言,专业过分细化造成画家的人文素养的缺失,进而影响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全面发展。今天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日本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颇为相似,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对当下依然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除去高雅的书法、绘画与刚强的雕刻、建筑,书中也记述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思想与风俗。后藤朝太郎由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与民俗出发,升华为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理解。他观察到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与中华民族的特点有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中国的文化就不会消亡,且中国文化根脉深厚,并生生不息。

在当时绝大多数日本学者对中国与中国人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后藤朝太郎无异于是个异类——他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衰败,就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中国是一个曾经辉煌过,但现在正在逐渐老去的大国”。只是在他看来,这样的否定态度意义不大,他更愿意平心静气地去研究中国。为此,他在晚年受到了来自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政治迫害,他的不少作品成为禁书,这对于一位坚守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是极度不公的。而后藤朝太郎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增进当时的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真实面貌的了解。今天,这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既是今人窥探20世纪初中国文化生活的一扇窗口,也是我们认识后藤朝太郎这位久被遗忘的日本汉学家的一道大门。

真正的快乐源自内心

□王淼

在我的印象中,非洲大抵是这样的:有古朴的民俗风情,有原始的自然风光,有广袤的沙漠和茂密的热带雨林,有众多带给人们无限遐想的神秘之境。非洲同时又是贫瘠之地,自然资源匮乏,人的平均寿命短,婴儿死亡率高,另外,还有疟疾、腹泻、艾滋病、寄生虫病等各种流行疾病。这些当然是一些比较平面的印象,大多得自于我平时阅读的书籍和所看的影视剧。那么,真实的非洲应该是怎样的呢?

澳大利亚兽医赫伯特·雷布汉曾经在非洲的马维拉度过了两年和平工作团的义工生活,他以朴实的文字记录下他在马维拉经历的点点滴滴,并将其结集为一本《巫医、动物与我》的小书。雷布汉以大量生动、感人的细节告诉我们,非洲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新思想与旧传统相互交织,也有很多不可解之处——惟其不可解,才具有某种神秘的魅力,才更吸引人去探索。

初到马维拉,雷布汉亲眼目睹了马维拉人的生活,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虽然是来自平凡家庭的平凡人,过着并不富裕的普通生活,但与马维拉人相比,他却感觉到自己是何其幸运且富有的人。

身为兽医,雷布汉的日常工作就是为各种动物治病,这些动物与马维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也借此机缘结识了许多当地土著。雷布汉每每走进一个家庭,这些家庭的主人都会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来款待他,而雷布汉也会毫不客气地大啖一番。直到有一天,雷布汉突然发现,自己吃掉的居然是一群饥饿孩子的食物,他感到羞愧不已,此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他虽然多少



会吃一点,但只是以不至于侮辱到任何人为限。

这是雷布汉在马维拉所学的第一课,对比马维拉人的生活,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他觉得他人生里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家,他的家人,他的衣服,父母端上桌的食物,他接受的教育……都显得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他觉得他应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马维拉人多做点事情。

在雷布汉结识的马维拉人中,他一直与巫医姆津巴大夫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雷布汉刚刚抵达马维拉,是姆津巴大夫第一个到访,不仅带来几只需要医治的小狗,还说了一句:“我已经等了你十六年,十六年前我就看到你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雷布汉的生活里经常会发生一些灵异的事情,比如,为了主持当地人的成年礼,雷布汉在赤裸的身体上涂抹各种颜料,并学习如何联结“圣灵”;身患重症疟疾,濒临死亡边缘,雷布汉却在最后关头转危为安;作为非洲人眼中的灵魂使者,雷布汉亲眼见证了每次猫头鹰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个令

人悲伤的消息;雷布汉曾经救治的两只狗,数次在关键时刻现身,将他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如此种种,既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却又与非洲这片古老的大地有着神秘的联系。

在雷布汉的义工生涯中,有两件事情值得大书特书。

第一件是他成功地教会了酒吧女露丝下象棋,并借此树立起露丝的自信心,让她得以“抬头挺胸骄傲地活着”。雷布汉同情酒吧女的悲惨命运,他知道她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老,艾滋病会提早结束她们的生命,使她们无法得到善终,而一点小小的善意,就可以让她们活得轻松、活得愉快。所以雷布汉经常为她们提供各种帮助,尽管这对于他不过是“举手之劳”,然而对于那些酒吧女却意义重大,他甚至让临终前的露丝有了做“皇后”的感觉。

第二件是雷布汉在酒吧跟人比腕力大获全胜,并因此获得了一大笔赌金。雷布汉利用赢得的赌金在琼巴牛场药浴池盖了一间新茅厕,在前草牛场药浴池盖了一间新鸡舍,修好了沙迪药浴池兽医助理家的屋顶,资助了酒吧女的抗生素,如果有人付不起牲畜的医疗费,差额部分由他来补……虽然雷布汉的手臂遭受很大损伤,但只要想到他用赢得的赌金为马维拉人做了很多事情,他就感到心满意足。

在马维拉生活的两年时间里,雷布汉既收获了欢欣与喜悦,也经历了令人心碎的悲情时刻。雷布汉认识到,真正的快乐源自内心,爱心与包容才是世间最重要的东西;他也理解了姆津巴大夫对他说过的那句话,重点是行动,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行动,“每天至少跨出一步,你就能发现,每一步都引导你更接近理想中的自己”。

我与书的故事

一本新书,一件旧事

□子张

三句不离莱芜。因为看到莱芜吴伯箫故居现状照片发了通议论,遂引发各地不少朋友的热心关注和以不同方式对故居保护做出的推动,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也因此结识了莱芜籍书友、如今在北京某机构工作的吕振先生。

莱芜很小,山东也不大,说来说去就会说出不少共同的关联,譬如除了都从莱芜出来,也还有彼此都熟识的一些师友。我虽然“南下”多年,总还是克服不了乡情的牵绊,故而接到吕振先生寄来的新著《书与信中的旧时光》,先就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

文字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总是能把不同作者微妙的情怀与文体传达得淋漓尽致,读吕振的文字,无论是“嗜书”“记人”还是“读札”“清赏”,我也总能清晰地感触到一种不难辨认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纯正莱芜人所具有的坦诚,率性甚至朴拙。自然,吕振的求学历程也给了他良好的学术敏感和思想力,这使他对人与书的把握都有着相当的精准度。尤其是,他对当代文学史中一种特殊的历史是非有着清醒的判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品质,似乎又不是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具备的。

从这些方面说,我以为《求教王得后先生×屠岸致丁景唐信札释读》《陈鸣树致陈涌信札释读》《学术与人格的师承》诸篇都有不少闪光的片段叫人有所会心,这些有灵性的感悟,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作者在求学路上不间断地对做人 and 做学问向善求真的强烈愿望和实际收获。

书中一篇文章提到关于吕剑回忆《诗刊》创刊情况的旧事,与我有关,我也想借此机会略作钩沉,算是对作者的一点回应吧。

1957年初《诗刊》创刊的前前后后,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在大同中也有小异,主要的小异之一是诗刊社与毛泽东商洽诗词发表的过程,之二是《沁园春·雪》中“原驰蜡象”之“蜡”字的修改问题,吕振《从吕剑手札追寻〈诗刊〉往事》一文作了很好的梳理,此处不赘,我只对文中“吕剑致徐迟、子张等友人的信札中,肯定还有很多尚未披露的细节”一句涉及我本人的部分略作解释。

“尚未披露的细节”的确有一些,比如我查了一下,最早在通信中向吕剑了解《诗刊》情况,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写一篇诗人与财富的文章,向他了解《诗刊》发稿费费和毛泽东有否稿费的事,吕剑回信中对此作了解答后,突然话头一转,说:“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诗刊》创刊,古诗十八首,是就徐迟平时积存的八首,由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约的,结果他寄来了十八首,实在出人意外。在诗刊,是由徐迟提出的,由臧克家拟稿写的信。”此外信中也提到了臧克家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那些“有鼻子有眼”的话,并表示“准备写一篇‘纪实’”。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信向吕剑提出“六问”的,而吕剑对“六问”的回答也几经修改,最后的定稿措辞亦相当慎重。此文先在湖北新华书店的内刊《崇文》上刊载,后来我又投给了北京《新文学史料》公开发表。“六问六答”发表后显然引起不少人注意,原《诗刊》社老编辑白婉清的文章似乎就是对此文的某种回应。至于“蜡像”之“蜡”字的修改,除了《关于与钱仲慈的通信答子张》一文,吕剑倒也没有再补充其他说明。

时过境迁,这些事恐怕也就很难彻底搞清楚了,但基本的事实清楚,我觉得也就够了。

“我与书的故事”征文

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哪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请把你与这本书的故事写下来。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投稿邮箱:qlbook@163.com

下载齐鲁壹点,关注青未了频道,与编辑私信互动,随时获知投稿、采用等相关信息。